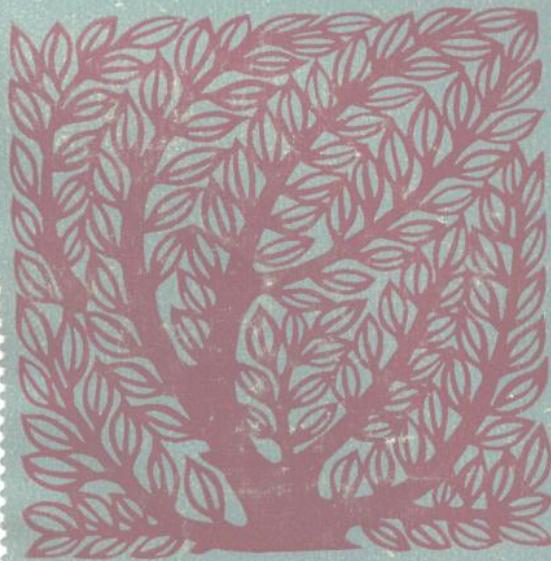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

# 王春元 文学评论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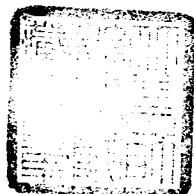
ZHONGGUODANGDAIWENXUEPINGLUNCONGSHU

# 王春元文学评论选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08322



湖南人民出版社

1008322

# 王春元文学评论选

责任编辑：肖汉初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5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66,000 印张：7.625 印数：1—2,550

统一书号：10109·1843 定价：(平装)1.20元 (简易精装)1.40元

#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序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是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密切合作下编辑的一套当代文学评论家的选集汇编。为当代文学评论出版丛书，建国以来，这是头一次。

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当代文学评论的经验，扩大当代文学评论的队伍，提高当代文学评论的质量，促进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

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是文学事业的双翼。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相互借重，共同前进。我们党历来认为，文艺评论是进行文艺斗争和繁荣文艺创作的重要手段。一个时期或一个时代的文学，不但由那个时期或那个时代的作家为标帜，而且以那个时期或那个时代的评论家为标帜。出现一个伟大的文学评论家和出现一个伟大的作家，对于文学史来说，意义同等重要。

但是，由于种种失误和偏见，文学评论有时被当作凌驾于文学创作之上的监督哨，面目令人生畏；有时被当成推销文学作品的广告牌，脸色显得苍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文学评论的状况大为改观。文学评论不但为文学创作开路，而且为文学创作服务；不但以尽可能正确的历史观点对创作进行思想分析，而且以尽可能正确的

美学观点对创作进行艺术分析。文学评论在拨乱反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方面；在同“两个凡是”进行斗争、在批判和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进行两条战线斗争方面；在大力扶植新创作，为日趋繁荣的短篇小说、勃然兴起的中篇小说和方兴未艾的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呐喊欢呼方面；在热情鼓励题材、体裁、风格、流派的多样化，坚定不移地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方面：都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文学评论积极参与整个意识形态拨乱反正的重大斗争，完成了历史的使命。然而，只要面对现实，面对党和人民对文学事业的要求，就不能不承认，文学评论不但落后于时代，而且落后于创作。这种落后状态主要表现在：文学评论对文学创作的新鲜经验总结不够，对文学创作提出的新问题研究不力，在推动文学创作发展上站得不高，缺乏理论的说服力和科学的预见性。

刚刚开过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向文学评论指明了前进的道路，这对于今后我国当代文学评论工作，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学评论工作者必须以此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坚持先进的世界观，努力以共产主义精神影响和教育人民，这就是我们的方向。

文学评论的队伍建设是个大问题。评论队伍的建设，一是思想建设，二是组织建设；既要提高，又要扩大。我们文学评论工作者应该认真学习十二大文件，划清共产主义和“共产风”的界限，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培养自己成为自觉的而不是盲目的、实际的而不是口头的、科学的而不是空想的共产主义战士。

士。只有使自己成为自觉的先进战士，才能真正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而不致迷失方向，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任务繁重而队伍甚小，这是个矛盾，扩大队伍的问题迫在眉睫。一九八二年七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河北涿县召开“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就大力发展文艺评论工作和充实文艺评论队伍的问题做了部署，响亮地提出“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所作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的口号。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今后的文学评论工作，势必有一个较大规模的发展。

我们这套丛书愿为文学评论的发展铺路。这套丛书倘能收到实效，还可以继续编下去，借以促进人才的更多发现。

我们仓促上阵，又无经验，缺点一定不少，欢迎批评指正。

冯 牧 阎 纲 刘 锡 诚

1982年10月13日

目 次

17084/15

老干部的新形象	( 1 )
浅谈《东方》英雄人物的个性化	( 20 )
巍巍青山	
——读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	( 25 )
谌容论	( 35 )
漫谈马克思戏剧形象的塑造	( 97 )
走出剧场后的漫想	
——评《灰色王国的黎明》	( 102 )
把美带到生活中去	
——谈谈话剧《明月初照人》	( 107 )
由《李慧娘》的重演所想到的	( 112 )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新人”说	( 117 )
论英雄人物的塑造	( 128 )
陆文婷的悲剧与生活的阴影	( 153 )
在心灵的阶梯上升高一步	( 157 )
可喜的科学成果	
——读《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的新译文	( 164 )

在前进中坚持“为人民大众”的根本	
原则	.....(170)
历史的惰力	
——评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几个观点	.....(178)
社会主义的自由文学和文学的悲剧性	.....(190)
艺术民主和创作自由	.....(195)
抽象人性论和创作思想	.....(209)
短论三则	.....(224)
新时期文学的估价和外来影响	.....(231)

# 老干部的新形象

不管人们怎么议论，事实上，我们的文学正沿着列宁曾经预期过的那种社会主义自由文学的道路前进。可以为这种文学列举出这样那样的特征，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则是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涌现。

从近一两年来部分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的人物塑造的情况来看，这种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既具有各自独特的个性，又打上了共同的时代烙印。涉及到的社会成份也很广泛，其中包括各级领导干部、工农兵群众、知识分子和其他各行各业辛勤诚实的劳动者。色彩缤纷，不拘一格，形成一组节奏和谐、音调铿锵的社会主义新人文学形象的赞歌。这里仅就几部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中，领导干部的新人形象的文学意义和思想特质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 创业艰难苦战多

提起领导干部，人们往往把他和“老”字联在一起：老同志、老干部、老革命、老延安、老八路、老一代……。这些自然的联想，意义虽不尽相同，却都浸润着群众的爱戴与尊敬的感情，

也多少包含着一点“敬老”的民族美德在内。可是，由于十年浩劫的后遗症以及其它种种盘根错节的历史机缘，近年来老青两代之间，甚至老中青三代之间出现了某种距离，以至隔膜，产生了所谓“代沟”之说。这种说法究竟有多少科学根据，不敢妄议。但它从一个特别角度反映出某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却是事实。四化建设的现阶段，离不开老的和比较老的（不只是从年龄的意义上）干部的正确领导。而有些青年对实现四化信心不足，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也就是对领导缺乏信心。因此，乔光朴这个社会主义企业的新型领导人的文学形象一出现，就立即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也就不足为怪了。继乔光朴而来的，相继出现了车篷宽（《开拓者》）、丁猛（《三千万》）、李日升（《艰难的起飞》）、黎白（《春之烦恼》）等一批领导干部形象。他们都是锐意改革、振兴中华、带头向前、奋进不息的人们；他们既是我党优良传统的继承发扬者，又是时代任务的自觉承担者，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开路先锋。许多作家正是通过经济改革的斗争和披荆斩棘的艰难创业活动，来揭示一代干部新人的性格特征和斗争内容的。

首先，这些新型改革家所面临的，往往是一个被权力角逐和市侩主义所污染了的社会面，他们必须以巨大的勇气和智慧，来冲决各种势力和利害关系所缠结的无形之网对生产积极性的束缚和对一切革新的阻碍。省委书记车篷宽经过调查研究，决心在自己分管的工业范围内，提出企业之间要竞争，开展市场经营，制定全省经济调整方案，用经济手段进行择优，以政策领导代替行政领导。由此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争论激烈，上至副总理，下至青年工人，都或深或浅卷进这场斗争漩涡。

车篷宽提出的这一套以工业调整、改革为中心的新经济政

策，深得民心，大受生产第一线群众的欢迎。可是同时又受到更多的部门的顽强抵制或变相抵制，上下左右都有不少握着实权的各色人物从中作梗。

●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改革触犯了已经根深蒂固的某些行之无效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及与这种体制相关联的权力。这一点，正象车篷宽的革新方案的拥护者们所议论的那样：“经济体制的改革，不可避免要使一部分人权力增加，一部分人权力缩小，这就会牵涉到各种利害关系……这是权力的再分配，也就是物质利益和特权的再分配。”这就是说，触动权力、地位的任何改革都会牵动许多人的神经，上至省委书记，下至工厂的厂长。这些被触动的神经线，组成了一张无形的大网，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朝着革新事业罩将下来。为此，一些有志于跟随中央三中全会精神实行改革的人感到忧虑，他们为车篷宽的改革前途担心：“不管老头自己意识到没有，他实际上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头羊。可是他能走多远？会不会作因搞改革而牺牲的替罪羊？”这种担心虽然悲观了一些，但也真实反映了许多盼望改革而又惟恐失败的群众的心情。而后来迫使改革方案搁浅的严峻事实，也证明群众的担忧并非全是杞人之虑。

这种革新之战的艰巨性、严峻性同样表现在短篇小说《三千万》中。小说描写的是省轻工局党委书记兼局长丁猛，为压缩一项基建工程的三千万元的巨额追加投资，而展开的动人心魄的斗争。丁猛的工作触及面没有车篷宽那样广泛，但那处境却要困难得多。他是作为上级行政管理机关到所属维尼纶厂的基建工程指挥部审查追加预算的，人生地不熟，并无一个助手，全靠自己打开局面，向着一个谁也不敢碰的、似乎全然不可改

变的“现状”进行一次冲击。

这“现状”是什么呢？是一个总概算才五千万元，实际上已花了一亿五千万元，搞了十年还竣不了工的“胡子工程”，还要申请花三千万元来扫尾竣工。而这项工程总指挥张安邦还坚持说：“三千万一个儿子也压缩不下去了。”但是，三千万不是工程的需要，而是“现状”的需要，张安邦自己说得明白：“现状就是这样。施工单位，你不给他算宽点，他就不干……征购土地，说是三年青苗，几百块钱一亩，实际上连钱带送设备，没有七、八千块钱下不来，这都是实际。缺设备，没车皮，要是手头仓库里没有几样硬牌货去换，靠计划，申请，一百年也不行。这‘三千万’，又不是我一个闹出来的，换个书记，没这‘三千万’，也竣不了工。”这段自白，虽说是打了折扣的，却多少也透露出些许有关“三千万”的“现状”后面隐藏着的奥妙。这奥妙就是以张安邦的权势欲为中心的物质利益、“政治”算计、人事关系、后门交易等等肮脏的绳索织成的，超越国家法定职权之外的隐形的权力之网。网上的每个结都是纵横交错、密密麻麻的权力点，每个点都牵连着许许多多利害关系的神经中枢。张安邦张开了这张网，罩住了一切。

但是，久经锻炼而又能站在时代前列的丁猛，依靠党性，依靠党的政策和对现实的深刻理解，他扛住了那些灰色的“网”、“沉默的墙”汇向自己的压力。他是强者，“他不相信中国就不行，不相信自己就不行，也不相信社会上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就能横行下去。当然，他头脑更复杂了，要纠正时弊，只能靠实际力量，唉声叹气毫无用处。”事实上也是如此。由于他锲而不舍地认真按照原则办事，到底还是给“三千万”捅了个窟窿，叫张安邦露了馅。与此同时，他不是还把周围一些人从那种唯唯

诺诺、颓唐软弱、悲观疲惫、安于现状、玩世不恭和精通势利的种种庸俗气中唤醒过来了么？正如丁猛自己常说的，要改变现状，只需要一点东西，那就是：“工作！”

其次，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要求一部分不再适应需要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发生相应的改进。这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起着明显的作用。拿车篷宽的话来说，就是：“经济改革的巨大杠杆，正在动摇着我们的官僚作风和保守的干部制度。”因此，在以经济调整、改革为己任的新人形象，差不多也都是克服官僚作风，改善过时的干部制度的积极倡导者和扎扎实实的实践家。有一次车篷宽谈到干部问题时，说：“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改变社会。我们的社会所以是这个状态，也和我们的干部制度有关。干部从上到下都是上级任免制，群众很少有权选举和罢免，没有正常的新陈代谢。就连工资报酬也和干部的工作成果没有多大关系。这就使有主动进取精神的干部，发挥不了作用；而更多的人是考虑怎样保持自己的职位，如何利用它追求更多的特权，决不愿冒风险去搞各种改革。他们要维持现状，吃现成饭，于是经济改革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严重阻力。”这些话反映了我们所有的革新家对我们的干部制度的看法和意见。因此，与其说他们几乎在每一项的经济改革的活动中，都要涉及干部制度和人材选拔培养的问题，无宁说，选贤举能，改善干部制度，正是当代新人从事社会经济改革活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且不说车篷宽如何推荐生产能手胡永方，提升有胆识有远见的曾淮，也不说丁猛怎样委重任于多年弃置不用的预算专家钱维丛，我们单只看看《春之烦恼》里的黎白，这位北大荒某农管局局长，在身患绝症，生命处于垂危之际，抢在死亡前面，为四化奉献的最后一份心

血，就是选贤用人，改造旧的干部制度。因为他透彻地了解人的价值。“北大荒的现代化是靠人化的”，“人材，首先是各级班子。把有真正真才实学的专业干部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这是关键。”

在许多新型的改革家的形象上，人们还可以看到，他们不但具有实干家的品质，而且还是善于动脑筋的真正够格的政治思想工作者。

车篷宽的革新活动取得了胜利，他自己却受到排挤。就在他被迫打了退休报告之后，却脱口说出了一个令人感佩的打算：“职务上退休了，思想上我可决不退休。我下一个研究课题，是现代化企业里如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不知道为什么过去往往喜欢把业务和政治对立起来，搞成两个永不碰头的南北磁极，似乎精通或重视业务的人政治上都差，而有些搞政治的人却总觉得不懂业务、不热心业务也自然高明。近两年来，这类观念起了一些变化，但还有些人把尊重科学、重视扎扎实实的业务工作的改革家、事业家看作不要政治或政治差的表现。这显然不正确。事实是，四化建设的带头人几乎都很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只不过他们不是政治空谈家，更不是把整人、搞运动、鼓吹血统论当作政治好的标尺，而是主张做真正科学的政治思想工作的。生活中如此，文学中也是这样。车篷宽在给企业团委书记凤兆丽的信中，针对现在青年人的思想状况，正确指出了这个问题。他写道：“你是做团的工作的，自己又是个青年人，应该成为党的出色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我所说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谈心，解疙瘩，交朋友。这远远不够。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在我们企业里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甚至连它的定义都被曲解了。因此，有些人，特别是年轻人，一

到思想政治工作这几个字就有点反感。其实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渗透到生产和管理中去，把思想政治工作同现代化生产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车篷宽事实上提出了一个从来还不大引起人们注意的问题，那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现代化问题。要研究人，研究生产第一线上的人——工人的思想情绪的变化发展规律，研究劳动者和生产环境的关系等等，从而把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当作一门富有生命力的现代科学来加以研究。

文学作品中革新家的形象往往是最有个性、进取心很强的实干家，同时又是热情洋溢的宣传鼓动家，不但车篷宽如此，丁猛、李日升、黎白也都是这样的人。他们总是在开拓工作当中，不断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点燃有些人心灵中已经湮灭了的“纯洁之光”。他们的每一次出击，并不全都成功，但总会唤醒一些被现实中丑恶的东西熏染或将被淹没的人。因为不管环境有多险恶，他们从不丧失对人的信心：人嘛，有好有坏，而好人总是多数。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使更多的人成为好人。——这是朴素的然而也是崇高的人事工作、政治思想工作者的美好愿望。

### 党性的召唤

一些作品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大多是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是崇高的称号。称号的崇高，在于内容，在于党性。斯大林说，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话过去常常被人庸俗化、曲解、利用，造成不幸，造成损失。我想，这“特殊材料”只能理解为党性。一个共产党员除党性而外，既无“特殊材料”，也无特殊价值，更无特殊权利。要不然，便是天大的误会。

张林的短篇小说《你是共产党员吗?》，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生动有力的共产党人的形象——北方铁路局局长刘大山。刘大山有句习惯语，叫做“你是共产党员吗”，每当事情涉及到党性原则的时候，便会脱口而出。因此，这句习惯用语就象他的个性那样地质朴、明快、热烈、坚定有力、诙谐风趣而又深沉蕴蓄。它涵括着无限丰富的庄严内容：有殷殷的期望、痛切的责备和深情的祝愿，还有充满激情的信任，肝胆照人的忠诚和义无反顾的献身。

刘大山在回忆、思索自己战斗的一生时，想到了家乡的土地、红枣，看见了战友死前的一双眼睛，听见了老师长的那声大吼：“你是共产党员吗？”他觉得，老师长的问话自己应当回答，每一个有着共产党员称号的人都应当回答。

是的，刘大山过去的历史已经响亮地回答了这句问话，现在的斗争还继续在回答。每一个战士的生活和斗争，都是在回答这句问话：车篷宽用改革经济体制、开拓企业经营管理的新路子来回答；丁猛用冲破“现状”，清除积秽，为四化打扫基地来回答；黎白用举拔贤能，匡正人事制度的弊端来回答；李日升用励精图治，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来回答；……还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已经用毕生的丰功伟绩和光荣的一代党风来完满地回答了；党的好女儿张志新以断裂的喉管，滴血的头颅冷峻地回答了；还有那无数的先烈以自己毕生的辛劳和苦斗，磨难与牺牲，最终地无愧地回答了这句问话。

为什么在这么一句简单的平凡的语言里，积蓄了那么多的力量，竟使得无数英雄儿女、志士仁人为之洒热血、抛头颅？答案是不难找到的：这力量来自一个共产党员的对于历史和人民赋予他的神圣职责的自觉性——这就是党性，党的意识，党

的荣誉和良心。

改造社会，创造历史，是每个共产党员应负的神圣职责。就这个意义说，每个党员都应该是站在时代前列的改革家、新生活的创业者。在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努力把从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最大的包袱——物质贫穷和精神匮乏——改造掉，而以创造神情并茂、丰富高尚的精神文明，创造日益富裕的物质财富为己任。因此，由于我们的错误造成社会停滞、人民生活贫穷落后、风气不正的现状，就不能不使真正的共产党人痛心疾首，忧虑不安，疚愧自责。黎白说：“作为一个管理农场的共产党员来说，看着这么好的地不能多打粮食，看着这么好的人民仍过着贫穷的日子，我的良心能让我平静、能让我躺倒不干吗？”丁猛对张安邦的斗争，虽然取得一定的胜利，但终于被张安邦挤走，他深感忧虑，但“他所忧虑的是这个党，这个国家！他不相信以后国家会落到一群没有一点共产党员气味的诸如张安邦那种人的手里；但是，现实的种种情况不能不增加他在这方面的忧虑”。刘大山这条汉子从来不把个人沉浮得失，恩怨荣辱当回事儿，然而当他看着眼前铁路运输的设备，陈旧古老的样子，心里就堵得慌：“‘落后啊！’他想着，‘中国的落后就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可有人还在睁眼说假话，美滋滋地说，还有人美滋滋地听信，明明是假话，却象真的那样一本正经。……党的威信降低了！这么弄，还能不低！群众不相信我们，这是对共产党员的最大的处罚’”。至于“四化闯将”李日升，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是个充满自信，在压力面前从不眨眼的人，却常常被一个问题搅扰得睡不着觉：“人民跟着共产党走了几十年，国家弄到这步田地，对不起人民！不应该干得好一些，使人民觉得社会主义有点意思，有点味道吗？……”如果在中国的大地上，